



公共卫生学：有多少『短板』等待『补齐』

■本报记者袁一雪

“这次疫情实则是公共卫生人应该冲到前线的，然而公共卫生领域发声真的很少。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都是五年医学专业，但公共卫生职业医生和临床职业医生就是天壤之别，公卫没有处方权。回到这次疫情，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做的就是配合命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世界卫生组织慢性疾病预防和控制顾问张作风眼中，公共卫生人本应是能够“抓住疯牛鼻子的人”。然而，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卫人的表现，近日一位公共卫生体系从业者的上述评述，却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学科从人才培养到体系运作所面临的困境。

“在任重道远的抗疫之战里，中国卫生防疫管理架构和公共卫生现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张作风说。

与健康最紧密的学科却最被忽视

传染病，包括霍乱、麻风病、结核病和疟疾等，曾经是影响我国公众健康水平最重要的疾病。通过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预防接种和爱国卫生运动等防控措施，我国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重点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当这些流行病或地方病淡出人们的视线时，临床医学就日益凸显出其重要的地位。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的到来，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2002年建立起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CDC)，到2007年已拥有国内各级疾控中心3500多个，全职人员共近20万人。

同时，“公共卫生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从前主要集中在传染病的防控上，现在延伸到了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非典之后，高校公共卫生学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浙江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吴息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然而，随着非典疫情被淡忘，各地政府与医院重新将数字量化的临床医学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处于上游的公共卫生学科与体系建设却几乎无人提及。

2018年，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主编的《中国公共卫生概论》正式出版。书中提到，“总体来看，中国专业公共卫生人才数量配置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实际上，每年真正需要临床医学医治的人群，只占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极少数，绝大部分人的健康问题都需要公共卫生体系的保障。“除了突如其来的流行性疾病、慢性病，人们的营养健康、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职业病等都属于公共卫生范畴。”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蓉西告诉《中国科学报》，“相较而言，临床医疗面对的是个体，公共卫生面对的则是群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每万人口中，仅有1.4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相当于美国的1/5；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妇幼卫生、采供血人才缺乏；卫生应急人员主要分布在卫生行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十分缺乏卫生应急管理人才和专家，大量卫生应急人力需要培训。

需求激增与人才流失

与大量公卫人才的需求缺口相比，公卫人才培养则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包含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等多个二级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等80所高校也都设立了公共卫生学院，但这一数字与我国2900多所大专院校的总数量相比，相形见绌。

2019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更是直指目前疾控系统的人心浮动和人才加速外流的现象：“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

一些高校公共卫生学的学生，在读期间就想转专业，很多人希望转到临床或其他学科。专业学习人群的不稳定，导致最后真正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并不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待遇较低，地位不高。如果从事公卫工作，待遇比不上临床或者其他专业，有些学生可能就不会把公卫专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吴息凤无奈地说。

这种状况在北京大学也出现过。据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介绍，本科期间，公共卫生专业就不是主流。尽管在招生时都属于医学类招生，但在本科学习两年后进行专业分流时，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临床专业，很少有人主动选择公共卫生专业。

收入水平较低是其中一个原因。2005年，一项关于公共卫生行业薪酬的调查问卷显示，中国多数基层公共卫生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公卫从业者的待遇，仍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的门槛上，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同等学历中国公卫从业者的收入与美国相差近40倍。在1420份调查问卷中，高达47%的受访者后悔进入公共卫生行业学习或工作。

与人才流失并行的是系统内人才评价标准的混乱。科研导向与实用导向混淆不清也是造成公卫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刘继同认为，

“与国外大部分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研究生相比，我国从本科就开始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且临床医学基础更有优势。”吴息凤认为，“未来，高校需要进一步重视公共卫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无论是专业型还是学术型。同时，希望公共卫生人才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临床背景，疫情发生时才能更好地为疫情防控服务。”

吴息凤提议，在进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时，还可以考虑另外建立一个“4+3”的培养机制。即前4年学习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后面3年进行全科医学规培，由公共卫生学院来培养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学主要面向社区人群，需要有预防医学的相关知识，由公共卫生学院对这部分人才进行多学科培养后，可以给予其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权利。

国际上，关于公共卫生人才体系如何建设的话题尚未有定论。“高校是否需要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或由各方临床人才集合组成公共卫生学院，是很现实的问题。”刘继同说。

杨蓉西也认为，目前我国具有临床经验的公共卫生学科教师不多，如果能让公共卫生学

科的学生有更多临床实习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临床医学和临床上遇到的现实问题，就可以更加有效地从临床现状出发建言公共卫生管理，或者应用到公共卫生工作实践中。

但不论哪种方式，学习医学的学生都应该具备公共卫生的知识储备。一些欧洲国家并没有在本科期间设立公共卫生学院，高校公共卫生学科也只培养研究生。这一专业招生时并不局限于医学专业，而是面向各个专业，“欢迎各领域人才进来，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公共卫生领域，同时让公共卫生领域拥有更多复合型人才”。刘继同认为，高校应该将公共健康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让所有高校学生都接受公共卫生的基础教育。

除了面向多学科的学生外，公共卫生学还应该加强对基层医务工作人员、社区诊所、小医院、居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等社会人员的培训。“当疫情发生时，社区的防控与家庭防控急需这类人。但他们首先需要具备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才能做到信息顺利上传下达、措施不偏不倚地执行，同时具备自我防护的相关知识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杨蓉西说。

国外也是多方力量协同进行公众的健康管理。如家庭医生、区域医院、保险公司、专项的体检机构等，都从生活方式、慢病治疗、健身康养等各方面予以支持。

此外，德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纳入社会管理体系，涉及的不仅是公共健康，还有经济发展状态、公共关系、社会心理等，因而会根据社会发展和公共需求对法案以及管理方案进行修订。修订时，往往会征求纳多方的意见，如政府官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基层工作人员，还包括私人企业家、律师等不同背景的人士。

“在我国，每个省份都可以考虑建立公共卫生专家库，但需要注意的是，专家库中的专家首先要吸纳具有多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并保证发言是平等的。”杨蓉西强调。

多层次人才不应局限于医学界和学术界，还应包括产业界和律师界，“产业界中不应只邀请国企，还应该包括民企，另外还要考虑到乡镇企业。”杨蓉西建议，“多层次人才共同参与，才能将某一事件还原得更接近事实。同时，在制定处理方案时，方能考虑社会各阶层人员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这样才能让公共卫生系统在最终运作时更好地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另外，公平是公共卫生系统另一重保障，不能唯权威论，因为团队中有教授或者院士，就忽略其他人的声音，“更不能因为某些领导的倾向性就众口一词地赞同。团队对于成员的献言献策要有一定的包容性。”杨蓉西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会议由政府较高级别领导的支持下定期召开，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甚至不需要面对面，电话会议也可。

不过，最终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根本动力，是让参与者感受到公共卫生学科的价值，“以及较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杨蓉西说。

走出高校围墙

除了吸纳多元领域的人才，公共卫生学科还应该主动走出高校的围墙。美国高校医学学者可同时供职于疾控中心。当紧急情况发生时，疾控中心首先“拉响警报”，而后的研究工作则由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完成。

“让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参与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教学中来，同时也让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师生参与到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分析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数据价值，改善师生实践能力，还能提高疾控中心科研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多方共赢。”吴息凤说，截至目前，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已与杭州市疾控中心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探索高校附属疾控中心的新模式，希望能够为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改革开个好头。

吴息凤认为，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疫情的防控首先要依靠专家、依靠科学。决策过程要依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机制，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保障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防疫中的作用，推动公共卫生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非典的成功防治就得益于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的献计献策。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希望能有更多的公卫专家勇挑重担，积极参与其中。我们需要让公卫专家在疫情防控中发出更多声音。”吴息凤说。

在刘继同看来，只要将公共健康问题真正融入中国发展战略中，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切实解决。“我国曾提出‘健康中国’的国策，但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如何有效地保证健康。”刘继同说，这次疫情提醒决策者乃至每个人深入思考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健康中国”？我国医药卫生体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何保障医学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妥善处理行政权威与专业权威关系，摒弃行政化带来的影响？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也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因此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的地位和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吴息凤说。

(相关报道见第8版)

中国大学评论

樊秀娟



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2月23日，教育部官网正式发布其与科技部共同研究制定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这是自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来的又一项重大推进措施。

“五唯”中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指标是论文，因为“帽子”、职称、学历、奖项几乎都依赖于论文。而目前国内“称霸”的论文主要是SCI论文，尤以高影响因子和高被引的SCI论文“为王”，这是我国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深受“SCI至上”负面影响却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本次《意见》的推出，直击“五唯”顽症痼疾之要害，对于确立中国教育科研的正确目标和评价导向、促进教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立健全、推动中国教育科研以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类进步为己任等，可谓相当及时且有力。引导和指导国内教育科研活动按规律办事，这是《意见》中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对于中国教育科研各项活动的科学意义有以下几点。

让SCI论文回归成果载体的模样。SCI论文是学者展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形式之一，所以发表SCI论文不仅是学者的科研需要，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必然。国家会一如既往地重视并鼓励学者发表高质量的SCI论文。《意见》强调摒弃“以刊评文”，不把SCI论文与优质学术成果直接画等号，这是基于SCI、SSCI、EI、CSCD和SCI论文的客观现实。很显然，SCI论文终究还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它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破除论文“SCI至上”，恰能使包括SCI论文在内的学术论著的内在品质得到更好的关注和发现。

让行政管理回归服务角色的模样。SCI论文及相关指标之所以会得到超乎寻常的重视，主要基于SCI评价体系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对全学科论文给出定量数据的评估工具。广大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也清楚其中的不合理，但出于行政管理和绩效考核的需要，也就将错就错下去了。这种行政权力对科研评价与管理的绝对主导，很可能导致科研质量和效率的低下。《意见》明确“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行政权力以管理学术的“把手”被卸除，将迫使高校行政管理回归到服务于教学科研的本职角色。

让科学回归探究真理的模样。科研世界博大精深，科研人员出于兴趣和爱好探索未知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受名利约束，心甘情愿长期坐冷板凳，吸引和支撑他们的是对科技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崇高信仰。在科研领域，所有的科研劳动都值得尊重，得到满意结果的科研劳动有价值，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劳动付出同样珍贵无比。《意见》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就要使发表SCI论文与名利思想脱钩，激励科研人员奋发追求真理、严谨求实、民主平等、敢于质疑、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胸怀大志，不斤斤计较于一时得失，更不为一己私利而学术不端，最终拿出优异成绩来回报国家和人民。

让外部环境回归安静放松的模样。高校办学治学需要一定的专注和沉静。各种“此起彼伏”发布的SCI论文相关指标、ESI指标排行以及以SCI论文、ESI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或以偏概全、或名不符实、大肆“渲染”指标数字的起起落落，殊不知一所高校的总办学质量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没必要看重数字的一时起落；教育科研指标理应是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为了数量而有意或无意忽视质量是相当危险的；有的重大科技成果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蛰伏”努力，数据的一时落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虽然高校应有不为外界左右的定力，但以目前高校所处的相对不够成熟的大环境而言，这类数据难免会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和资源获得。《意见》叫停这类数据的发布，是免除高校无谓焦虑、助其安心踏实搞建设的实力之举。

让同行评议回归客观公正的模样。《意见》针对高校内外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的问题，提出“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学术同行评议制度是相对客观、科学和公正的科研评价技术和手段，也是国际通用的科研评价的做法。客观上国内学术界对学术同行评议制度颇有质疑，认为在国内现有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生态下，同行评议会演变为学术权威、长官意志的“一言堂”，以及各种帮派的“人情关系网”。的确，同行评议决策的科学性主要取决于评议专家的个体素质和评价经验。为此，此次《意见》实施正是解决中国学术同行评议专家主观公正性问题的难得契机，要切实构建起评审专家的遴选制度、承诺制度、回避制度、信誉制度、追责制度等。

再次强调，中国学者科学研究和成果交流需要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SCI期刊也需要刊载中国的各种论文成果。在中国国力和科技强盛的今天，中国学者的SCI论文不可或缺，中国学者发表高质量的SCI论文更值得鼓励并以此为荣。《意见》坚决破除论文“SCI至上”，是要扭转对于SCI论文“符号化”追捧现象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中国教育科研改革和评价又到了新的发力阶段，摒弃论文“SCI至上”正当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学评价指标研究”(编号BIA160125)资助)

摒弃论文『SCI至上』正当时